

應區別政治的保守主義 和文化的保守主義

• 葉 雯

甘陽說保守主義在大陸知識界成為主流，我以為這一結論未免下得過早。由於目前大陸的語境只有保守主義的輿論可以公開化，而自由主義是不容許發聲的，甘陽列舉的五種保守主義話語有反「保」擴大化的嫌疑。

讀了《二十一世紀》今年第一期一組討論90年代中國保守主義的文章，覺得本來是比較清楚的問題，似乎被越搞越糊塗了。自從貴刊首先發起的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討論以來，一種兩分法的思維模式在學界蔓延，激進／保守成為兩隻現成的框子，非此即彼。讓人感到在對象的事實性方面還未有基本的分疏之前，已經有長篇的結論迫不及待地出現了。哈貝馬斯 (Jürgen Habermas) 對當代西歐的保守主義也有分析和批評，但他將它們分為老保守主義、新保守主義和青年保守主義三類。他是對啟蒙運動以來的現代性的態度作為參照的。那麼中國當代的保守主義又有那幾種，又以甚麼作為參照呢？甘陽的文章列舉了理論的、歷史的、文化的、政治的和經濟的五種保守主義話語，但這僅僅是簡單的現象羅列 (且有擴大化的嫌疑)，尚未作出類型學意義上的區分。

我以為，首先要將政治的保守主義與文化的保守主義加以區分，大致來說，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種：

在政治層面上，有兩種保守主義，參照系是對現行「後極權體制」的認同感。一種是老保守主義，也就是固守傳統意識形態的所謂「原教旨主義」。他們認同和維護「極權主義」，但對「後極權體制」中的某些「後」的成分不滿，比如市場經濟等。另一種是新保守主義，是從所謂的新權威主義發展而來，是「後極權體制」政治上的認同者和理性上的辯護者，而且常常以民族主義、愛國主義、甚至所謂的經濟自由主義作為招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近幾年一些原來的自由主義者也開始加入新保守主義的行列，《與總書記談心》就是一個象徵。

在文化層面上，保守主義也有兩種思潮，參照系是對五四以來新文化 (現代性) 的態度。其一是新國學，是在學術話語的層面上重新承接王國維、陳寅恪的傳統；其二是後殖民思潮，其源頭來自西方的薩伊德 (Edward Said)，是對五四以來的現代性話語的全面反動，但自身的正面主張卻甚為模糊，是一種激進的、虛無

主義的文化立場。文化層面的保守主義可以說是文化上的民族主義。

必須注意的是，政治和文化層面的保守主義儘管有某些暗通之處，但不能簡單地將兩者等同。一些政治上「後極權體制」的擁護者在文化上可能還是很激進，繼續反傳統的。而新國學的政治態度是不在場的，即從政治話語中退出，他們很像十九世紀的德國思想家，僅僅維護內心的精神自由。將政治保守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籠統地分析，是不規範的，也是不慎重的。

甘陽說保守主義在大陸知識界成為主流，我以為這一結論未免下得過早。由於目前大陸的語境只有保守主義的輿論可以公開化，而自由主義（不說激進主義了）是不容許發聲的，所以不能以此判斷思想界的主流。而且甘陽列舉的五種保守主義話語有反「保」擴大化的嫌疑，保守主義可以反思法國革命，自由主義也可以，不能說一反激進就是姓「保」。至於說「反民主的自由主義」，實在不知道甘陽究竟何所指。如果是指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，那麼說他們是自由主義實在抬舉了，因為他們只有自由主義之名，或者只要經濟上的自由主義，而不要社會、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自由主義。如果指的是文化民族主義者，那麼他們基本是對政治問題保持沉默，那「反民主」又從何而來？

在目前的大陸語境下，自由與民主、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決非衝突的。當一個社會連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領域都沒有的時候，繞過消極自由談甚麼直接選舉不是很滑稽麼？中國當然需要民主，但更需要消極的自由，沒有消極自由的民主，我們已經領教得夠多了。那些政治上的新保守

主義當然防範民主，但首先壓制的是公民的消極自由。我們固然愛民主，但更需要的是自由。自由是民主之魂，托克維爾(Alexis de Tocqueville)首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，然後才是一個民主主義者，否則他不會注意市民社會的問題。

以我的觀察，目前中國的思想界，在社會政治問題上，大致有三種互動的思潮。一是自由主義，主要是在知識階層，他們更多地感受到公共空間的不自由，所以更注意的是「消極自由」（但一般不反對民主）。二是新民粹主義，他們比較貼近社會底層，更多地不滿市場經濟發展以後給社會帶來的不平等和不公正，在這個意義上說，他們爭取的主要是為一般大眾所需要的民主（平等和公平），而不是知識階層所需要的自由（但他們也不反對自由，因為作為知識份子，他們自身也深受不自由之苦）。而既反對民主又反對自由的，倒是那第三種思潮——即上述提到的政治新保守主義。

在目前的大陸語境下，自由與民主、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決非衝突的。當一個社會連自由發表意見的公共領域都沒有的時候，繞過消極自由談甚麼直接選舉不是很滑稽麼？那些政治上的新保守主義當然防範民主，但首先壓制的是公民的消極自由。

